

甘肃省博物馆编 俄军主编



甘肃省博物館

文物精品图集

三秦出版社

甘肃省博物馆编 俄军主编



甘肃省博物館

文物精品图集

三秦出版社



甘肃省博物馆编 俄军主编

甘肃省博物馆

文物精品图集

三秦出版社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

策 划：韩博文 俄 军

主 编：俄 军

副 主 编：张立胜 王裕昌 林 健

学术顾问：初世宾 祝中熹

文字撰稿：贾建威 王 勇 李晓青 卢 冬

编 辑：卢 冬

责任编辑：靳 疆

摄 影：赵广田 严钟义

装帧设计：严钟义工作室

序 言

甘肃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李 膺

期望已久的甘肃省博物馆新展览大楼即将竣工,《甘肃古生物化石》、《甘肃彩陶》、《甘肃丝绸之路文物》三项大型展览已筹备就绪,不久可与观众见面。正为此感到喜悦之时,又欣闻《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已编成,正待付梓,兴奋之情油然而增。

甘肃省博物馆是陇原大地文物珍品的荟萃之处,又集中了许多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人才,应当说这部书的质量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博物馆的同志们出版这本图集,选择了很好的时机。从小处说,图集展示了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历史文物的精品,将把读者引进一个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文明殿堂,立意于使社会和大众对博物馆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壮大声望的同时,推动今后业务工作的开展。就大处讲,此举正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以人为本,创造和谐社会的新阶段,甘肃省博物馆的重新开放以及图集的出版发行,必将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而发挥出积极作用。

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殊历史,决定了这一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的丰富多样和独具异彩。甘肃因此而被公认为特色鲜明的文物大省,甘肃省博物馆也因此而成为深受海内外赞誉的藏品大馆。甘肃保存文物数量众多,其中不乏价值连城之物,这是甘肃人民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不同于经济能源,它越开发越丰富,越开发其价值越得以显现,可谓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大力开发这一资源,研究、宣传这些宝贵文物,开辟人们认识和欣赏文物的方便渠道和窗口,帮助人们解读文物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使文物对人思想信念的影响和审美意识的熏陶能够得以健康发挥,这便是文博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举办有关展览,是博物馆宣传文物的基本方

式，但不是惟一的方式。如果能根据社会大众的需求，编印一些文物图集或文图并茂的通俗读物，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同时对举办展览也是一种辅助。印刷读物既可以突破展览在场地、时间、规模以及讲解水平等方面的局限，又可以让人们更广泛、更深入、更悠闲地赏鉴文物精品，并能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这项工作，甘肃省博物馆过去做过，但编印规格如此宏伟、选品如此精博的综合性图集，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单就这层意义上说，这件事就很值得祝贺。

我衷心希望这部图集在给读者带来惊喜的同时，也为甘肃省的文博事业增添新的活力。

2006年3月

目 录

序言 李 膺	5	葫芦形网纹单耳彩陶壶	45
甘肃省博物馆历史文物述略 俄 军	13	旋纹带流彩陶罐	46
史前时期文物 26-64		贝形纹彩陶罐	47
宽带纹三足彩陶钵	27	旋涡纹彩陶罐	48
彩绘符号陶片	28	菱格纹彩陶盂	49
绳纹红陶圈足碗	28	菱格纹单耳彩陶壶	49
鱼纹彩陶盆	29	四大圈旋纹彩陶壶	50
斜线三角纹彩陶盆	29	圆圈网格纹鸟形彩陶壶	51
猪面纹彩陶壶	30	四大圈纹彩陶壶	52
弧边三角纹彩陶盆	31	神人纹彩陶壶	53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32	变体神人纹彩陶瓮	54
鲵鱼纹彩陶瓶	34	神人纹鸟形彩陶壶	55
红陶人面像	36	折线纹桶状彩陶杯	56
内彩旋纹彩陶豆	37	条纹鸟形罐	56
对鸟纹彩陶壶	37	涡纹彩陶瓮	57
旋纹尖底彩陶瓶	38	方折纹单耳桶状彩陶杯	58
条纹带盖彩陶罐	39	回纹彩陶纺轮	58
叶形纹彩陶铃	40	石雕人面像	59
大锯齿纹彩陶瓶	40	镶骨珠骨簪	59
内彩人面纹彩陶盆	41	红陶人头像	60
彩陶鼓	42	绿松石项链	62
旋纹圈足三联彩陶杯	43	兽形灰陶盃	62
网纹束腰彩陶罐	43	白玉璧	63
葫芦形网纹彩陶壶	44	青玉璧	63

蚕纹三联陶罐	64	溪伯铜簋	82
绳纹红陶筒瓦	64	勾铜甗	83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文物 65-100		徙遽癸铜盃	84
球形石权杖头	66	虎纹铜钺	85
玉凿	66	人头形釜青铜戟	86
三狗钮盖彩陶方鼎	67	镂空鞘青铜短剑	88
双钩纹彩陶鬲	68	父乙铜卣	89
犬首人身纹彩陶罐	69	垂鳞纹秦公铜鼎	90
太阳纹双钩纹彩陶罐	70	环带纹铜鼎	91
人面柄首铜匕	71	翼兽形铜提梁盃	92
席纹彩陶罐	72	线刻射猎纹骨管	93
倒三角纹彩陶罐	73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	94
父癸铜卣	74	云纹圭形金饰片	94
父辛铜斚	75	虎噬羊纹金饰片	94
父丁铜角	76	四鸟纹金饰片	95
伯作铜爵	77	盘龙纹金饰片	95
青铜大圆鼎	78	青铜麋鹿	96
玉人形铲	79	鹰头形青铜权杖首	96
玉人	79	鼎形铜行灯	97
溪伯铜尊	80	青铜镂空双驼饰牌	98
溪伯铜提梁卣	80	透雕双马咬斗青铜方形饰牌	98
溪伯铜盃	80	蜻蜓眼琉璃珠	99
溪伯铜方鼎	81	团花纹环耳铜敦	100
漂伯铜提梁卣	82	秦、汉时期文物 101-167	

两诏铜权	102	木舞俑	123
铜诏铁权	102	木侍俑	124
启合铜灯	103	木牛车	126
《仪礼》简	104	木牛车	126
王杖简	106	木牛拉犁	128
医药简牍	107	木马	129
安息铅币	108	木马	130
苣	108	彩绘木辎车	132
彩绘墨书铭旌	109	彩绘木独角兽	134
彩绘墨书铭旌	110	彩绘木独角兽	134
漆栳盘	111	木独角兽	135
“白马作”毛笔	112	织锦绣绢针黹盒	136
肩水金关纸	112	纺线锭、缠线板	138
丸墨	113	彩绘人物木板画	139
蟠螭盖三足石砚	113	饲猪图木板画	139
彩绘木雕博戏俑	114	禽鸟纹绣花边	140
彩绘木鸡栖架	116	绢底平绣人像	141
彩绘木鸡	116	铜奔马	142
彩绘木鸠杖	117	铜车马仪仗俑队	144
木鹅群	118	铜主骑	150
木羊群	119	铜从骑	151
彩绘木猴	120	执戟铜骑士	152
彩绘木卧狗	122	执矛铜骑士	153
彩绘木卧狗	122	铜骑吏	154

御奴驾马铜轺车	155	铜龟	172
鎏金错银铜扣漆尊	156	“驿使图”壁画砖	173
鎏金错银铜尊	157	“耕种图”壁画砖	174
十三盏铜连枝灯	158	“牧畜图”壁画砖	176
绿釉陶楼阁	159	“烤肉煮肉图”壁画砖	176
铜博戏俑	160	“双驼图”壁画砖	176
金镡	162	“宴居图”壁画砖	177
玉蝉	162	青白玉卧羊	177
玉带钩	162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卷	178
铜独角兽	163	马德惠石造像塔	180
浮雕人物石摇钱树座	164	高善穆石造像塔	182
玉眼盖	166	彩绘供养菩萨像壁画	183
猪形玉握	166	彩绘菩萨像壁画	184
谷纹玻璃璧	167	彩绘影塑供养菩萨像(两件)	186
炭精雕羊	167	石雕彩绘释迦多宝佛像	187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物 168-193		大统二年权氏石造像塔	188
“晋归义氏王”金印	169	彩绘泥塑供养菩萨像	188
“魏归义氏侯”金印	169	权氏造千佛碑	189
“晋归义羌侯”金印	169	《贤愚经》卷之二	192
骨尺	169	王文超石造像碑	193
“武乡亭侯”鎏金铜印	170	隋、唐、五代时期文物 194-239	
佉卢文木简	170	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	195
炭精猪形握	171	开皇元年彩绘石造像碑	196
“杜宝”玉印	171	石观音菩萨立像	198

《优婆塞经》	200	鎏金错银舍利铜棺	230
《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之二》卷	201	彩绘木塔	232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	202	石雕舍利棺	234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204	宋、西夏、金、元、明、清时期文物 240-301	
彩塑胁侍菩萨	206	铜密宗降魔金刚杵铃	241
梵文彩绘陶塔	208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242
三彩骑俑队列	209	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	248
三彩女骑马俑	210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碗	249
三彩男骑马俑	211	定窑刻划莲花纹瓷洗	250
三彩胡人牵马俑	212	“熙州管内观察使”铜印牌	251
三彩胡人牵驼俑	213	磁州窑虎纹瓷枕	251
三彩文官俑、三彩武官俑	214	摩羯纹铜镜	252
三彩天王俑	217	耀州窑青釉卧狮盏	253
三彩镇墓兽	220	官窑粉青釉多棱直颈瓶	254
三彩卧牛	222	黑釉剔刻牡丹纹罐	254
三彩立牛	222	黑釉剔刻牡丹纹六系罐	255
彩绘武士骑马俑	223	西夏文楷书医方残片	256
三彩凤首壶	224	西夏文印本《三才杂字》残片	257
巩县窑白釉瓷壶	225	西夏文“首领”铜印	257
瑞兽葡萄纹铜镜	226	彩绘韦驮壁画	258
鎏金铜梳	227	《米拉日巴事迹》唐卡	260
联珠花鸟纹波斯锦	227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262
对鸟纹织锦	228	莲花形玻璃托盏	262
红地中窠小花对鸟纹锦	229	琉璃塔	263

龙泉窑青釉瓷匚	264	镶玉宝石二龙戏珠金簪	283
金箔章家造黑釉瓶	265	金凤凰	284
木屋	266	金龙	285
菱花织金锦抹胸	272	雄鸡牡丹纹镂空玉带板	286
镶宝石笠帽	273	“庄严妙相”象牙印	288
前加檐笠帽	274	宗喀巴铜坐像	288
妆花凤戏牡丹纹绫夹衫	275	永乐款鎏金菩萨坐像	290
罗质夹袄	276	阿文铜香炉	291
妆花云雁衔苇纹纱夹袍	278	彩绘泥金手抄《古兰经》	292
粧金沙	279	肃府本《淳化阁帖》	293
青玉带钩	280	青花人物纹碗	296
黑釉火蒺藜	280	左旋法螺	297
金镶玉葫芦形耳坠	281	金城揽胜图	298
镶宝石金帽饰	282		
凤纹镂空金霞帔坠子	282	后记	302

甘肃省博物馆历史文物述略

甘肃省博物馆 馆长

常言道“山川钟秀，人杰地灵”，这是在强调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同社会发展及文化面貌的关系。一个地区的方位、形胜和生态环境，必然影响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群体，制导着经济、文化的性质和发育程度，造就该地区的人文背景，从而决定该地区在国家和民族整体中的处位与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这句俗语放到时间长河中阐述，也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培育了一方的历史。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母亲河——黄河的中上游，东西跨度达1520公里。青藏高原、阿拉善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在省域交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陆河流域三大水系在境内分流，是我国政区中惟一包括三大自然区的省份。山地起伏，岭塬绵延，河流广布，深谷纵横。从宏观角度看，这里是亚洲东部与亚洲中部的分野地带，大致以乌鞘岭为界，以西地区河流皆为内流水系，属亚洲中部；以东地区河流统属太平洋流域，属亚洲东部。“甘肃省位于上述界限两侧这一特点，使它理所当然成为东亚与亚洲中部、西亚和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孔道。古代丝绸之路和现代的新亚欧大陆桥均取道于此，决非偶然现象。”^[1]从微观角度说，省内各地的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水源存在巨大差别，形成了许多适宜于人类群体生存的小型区域性生态环境，为远古时代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明时代多民族并存共生创造了条件。因此，甘肃境内不仅是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曾是一些种族转移迁徙的通道；后来又是各种类型的古文化育生递接，众多民族活动、交往、冲突、融汇、定居的舞台。在中华民族基本形成之后的漫长历史中，甘肃是农耕、游牧、骑猎三大文化圈的切合地带，不同经济形态的碰撞和渗透，使社会文化洋溢着地域性特色。商周时代甘肃东部崛起过一些氏邦方国，如泾、渭流域的豳和密须，西汉水上游的嬴秦等。它们尊中央王朝为宗主，文化上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同时又和西部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沟通、认接华夏与戎狄的桥梁和纽带。西部地区对中原政治、文化日趋增强的向心力，就是由它们培育起来的。秦汉以后，甘肃一方面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又是封建王朝西北边域的塞防要地。境内驿道通

畅，烽隧相望，亭障遍设，重镇棋布，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丝绸之路”，几度勃兴。大量古代文化遗存，不仅呈现出本地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状况，也反映了中外物质、精神交流的频繁和昌盛，以及国家民族政策、西部行政和边域防务的实情。上述历史背景奠定了甘肃地区深厚而卓异的文化底蕴，并决定了今天甘肃省古代物质遗存丰富且具特色的优势。这是甘肃省博物馆文物收藏的土壤和根底。

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36年的甘肃科学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该馆更名为“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按历史、自然、社建三大部为主体的地志馆模式，正式建立甘肃省博物馆。现藏各类文物共约9万件，其中历史文物近6万件。文物来源一部分由原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一部分系建馆以来历年的社会征集，而大部分出自考古发掘。堪称精品的历史文物在3000件以上，内含国宝级文物16件（组），国家一级文物680余件（组）。它们都是甘肃古代文明的物质载体，蕴含着无限量的社会信息，或直接而充分、或隐晦而局部地反映了古代甘肃的历史演变与人文面貌，内秉特异的气质，外显亮丽的风采，具有历史的和艺术的多重价值，既是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又是可供观赏的稀世珍宝。为了配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的出版，撰写此文对馆藏历史文物略作绍述，希望能通过举示其中一些炫目的亮点，引领感兴趣的读者作较深入的赏览或研究。

一、气象万千的彩陶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彩陶则是原始社会氏族制度发展到鼎盛期，制陶业进入更高阶段的产物。彩陶的生产不仅为满足群体物质生活的需要，也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审美需要，已集实用和艺术于一体。彩陶日趋繁丽的纹饰，既表现了先民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认知，更反映了先民的生活情趣和对美的追求，展示出先民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升华。甘肃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带，是我国早期农业发源区之一。在黄河母亲乳汁的哺育下，距今约8000年前就诞生了比仰韶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的大地湾文化，出现了同西亚两

河流域彩陶遥相呼应的我国最早一批彩陶。发展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工艺进入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到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历三期而未衰。坚腻的胎质，丰繁的器类，缤纷的色彩，绚丽的图案，可谓气象万千，令后世盛赞不已，甘肃也因此拥有了“彩陶之乡”的美誉。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在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青铜文化中，彩陶工艺虽呈衰势而余辉仍璨，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具风姿。所以说，甘肃彩陶不仅出现年代最早，分布地域广阔，且延续时间特长，艺术造诣辉煌，其他地区的彩陶制作，都难望其项背。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距今8000—2000年间省境所出各个时期的彩陶约5000件，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精品多达200余件，人们称之为彩陶宝库，并不过分。

大地湾文化彩陶纹饰，最先出现在与初民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食器钵的口沿上，不论三足钵还是圆底钵，口沿内外各绘一周暗紫色的彩带，外沿宽于内沿。可别小看这道不起眼的彩带，它是神

州大地上熠熠升起的彩陶工艺一抹霞光，张朋川先生曾誉之为“一画开天”。^[2]大地湾文化的这批陶钵，是我国彩陶的鼻祖。继大地湾文化之后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甘肃省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包括自然形纹和几何形纹两类。最引人瞩目的是出土于秦安县王家阴洼的猪面纹彩陶壶，细泥橙黄陶，细颈折腹小平底，褐色彩，上腹部绘一圈二方连续的猪面纹，夸张地表现了猪嘴的正面，又运用双关修饰手法，让互连的猪面巧妙地共用一只眼睛，使图案简洁明朗而又生动逼真。甘谷县西坪出土的石岭下类型鲵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陶，小口圆肩，长腹平底，腹中部两侧出桥形耳，一侧正中用黑彩绘弯躯折尾的大鲵一只，

双目圆睁，大口露牙，鲵身披鳞，上部出一对肢爪，长尾上折至鲵首。以鲵鱼纹装饰器面在同期文化彩陶中多有发现，当与部族的图腾崇拜有关。由于鲵首形象酷似人面，故有学者认为表现的是人首龙身，乃传说中华始祖伏羲的象征。此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马家窑文化彩陶以纹饰鲜明、构图精丽而著称，图案多采用以点定位的方法，结构复杂多变，线条清朗柔和，色彩纯正浓亮，从不同视角都能看到优美协调的画面。以河流水花为题材的旋涡纹和波浪纹，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样。奔涌的急流，旋动的水涡，溅起的浪花，跃然于器表，把流水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艺术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旋纹尖底彩陶瓶

典型器物如出土于陇西县吕家坪的旋纹尖底彩陶瓶，橙黄细泥陶，小口长颈，丰肩收腹尖底，腹中部两侧出一对系绳用的小拱耳。器表细腻，打磨光滑，通体施黑



内彩旋纹彩陶豆

彩。肩、腹部饰展开的四方连续旋涡纹，间饰如浪花四溅的圆点纹。构图规律而不呆板，纹样繁盛而不拥挤，疏密有致，动感强烈。用这种涡流图案装饰专用于汲水的尖底瓶，更能引起无限遐想，颇具匠心。马家窑文化彩陶还盛行内彩，如兰州市小坪子出土的内彩旋纹彩陶豆，腹外壁宽带弦纹之间饰弧线主次分明的水波纹，腹内壁饰由宽弧旋带组成，涡心呈正圆的卷浪纹。内外彩纹相呼应，魅力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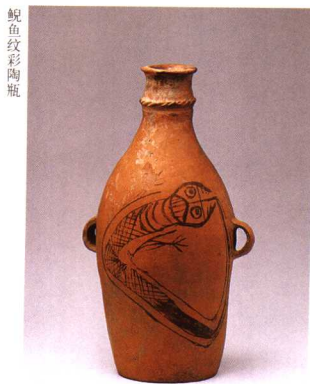
随着史前社会的发展和群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彩陶工艺越来越趋于成熟，彩绘手法与意蕴也在不断进步。由最初纯朴的线条及线条的交接组合，到对自然界中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各种事物的仿照写实，再到把写实形象简化解构，抽象为有含义的几何图案，显示了先民审美意念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的成长历程。艺术表现手法的千招万式，在这一历程中不断酝酿、萌生、衍变、改进，臻于完美。而人的自我意识，也在这一历程中逐渐形成并显露，艺术创作表现人类自身的理念和冲动，也便日益



宽带纹三足彩陶钵



猪面纹彩陶壶



鲵鱼纹彩陶瓶

红陶人面像



强烈。这是人面对自然感知到自身力量的结果。因此，在彩陶工艺中人体形象渐次出现，这既反映在彩陶的纹样上，也反映在彩陶的造型上。许多动物图案被人格化、神人化，除了仰韶文化彩陶的人面鲵鱼纹和人面鱼纹外，半山、马厂类

型彩陶盛行的蛙形神人纹，是更典型的例证。有些陶器直接以人体形象作器形，或把人面形象塑为器物的某一部分。天水柴家坪出土的红陶人面像，即为一件陶器顶部断离后残存的部分，浮雕与镂孔相结合，五官配置准确而细致，灵动传神，技法高明。最具代表性的人体形象彩陶，首推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头形器口彩陶瓶^[3]。这是件罕见的史前人首立体雕塑，全器呈钵形，长弧圆鼓腹，小平底，器耳缺失。器口以堆塑、镂孔、阴刻等技法，圆雕一人物头像，长发齐颈，短髭掩眉，端鼻小嘴，双目深邃，下巴短平，双耳有供垂饰之圆穿。和上文所述红陶人面像一样，为典型的黄种人面庞。通体用黑彩绘弧边三角纹和豆荚纹构成的3组图案，呈现出庙底沟类型彩陶纹样纷错、笔意舒放，在无规则中寄寓美感的构图风格。器口塑像多数学者认为是女性形象，又由于匏（葫芦）在我国民俗文化中一直被视为生殖崇拜的象征物，故有人谓全器塑造了一位身着花衣的孕妇，蕴含人口繁衍、族体昌盛的意念。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二、源远流长的青铜器

我国的青铜制作，萌生于河陇地区。众所周知，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刀是迄今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青铜器。该刀含锡量在6%—10%之间，系用两块陶范闭合浇铸而成，经碳14校正年代，距今约有5000年。尽管其原料可能出自铜锡共生矿的冶炼，依赖于氧化共生矿的还原，尚处于青铜铸作的孕生期，但已奏响了青铜乐章的序曲。在马厂类型遗存中也有青铜刀具发现，形制较林

家村所出刀已有改进，显示出早期青铜制作在甘肃地区的持续发展。至齐家文化时期，虽然仍未出现青铜容器，但小件青铜器的类型已颇多，而且发明了青铜圆镜，镜背上已开始铸出我国最早的青铜纹饰。康乐县苏集乡塔关村出土的齐家文化青铜短刀，长柄环首，刀端微翘，刀身的宽窄变化与弧度巧妙配合，造型轻灵优美。同马家窑文化青铜刀相比，工艺的进步显而易见。齐家文化之后在甘肃地区兴起的几支地域性文化，继承、发展了齐家文化青铜制造业，在青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格和技术诸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传出广河县、属辛店文化的人面柄首匕，即很能说明问题。此匕柄首为一圆形浮雕人面，双目圆睁，鼻梁高直，厚唇微凸，表情神秘。以人面形象装饰匕首，是一种奇妙的创意，表明青铜制作已跨过实用的门槛，进入审美领域。此匕柄首乃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人面雕像。



人面柄首匕

甘肃东部与关中邻接，经济上同属农耕文化圈，在华夏主流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较早地进入了文明期。商、周时代这一带出现了一些贵族政治体制的小方国，它们臣属于中央王朝，也都具有崇尚青铜器的传统。所以，正处于辉煌阶段的商周青铜制作，必然在这一地区留下印记。尤其是西周时期，甘肃东部是王朝的畿外门户，是王室联络、控制西部诸戎的襟带和屏障，是统治集团曾着力经营的战略要地。后世这一带商周重器频频面世，原因即在于此。西周早期大圆鼎，即出土



大圆鼎

于灵台县百里乡洞山村。此鼎厚立方耳，深鼓腹，圆底，三柱足略有蹄意。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脊，饰6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尾爪俱全的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饰勾连纹，形成当时尊贵器物上常见的“三层花”。腹内壁近口处铸族徽“𪚩”。形制浑厚典庄，纹饰瑰异，气韵不凡。到目前为止，仍是甘肃省内出土圆鼎中规格最高的一件。上世纪70年代，在灵台县白草坡发掘、清理了一批西周墓葬，其中属西周早期的漂伯墓和溪伯墓，有大量青铜器物集中出土，曾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礼器类型齐全，



人头形盔青铜戟



镂空鞘青铜短剑



耳形虎纹铜钺

形饰华贵，且多有铭文。还包括一部分商代器物，那是黑、奚二伯的家族在灭商时所得的战利品或赏赐品。如父丁角、父辛罍、都属商器。出土于黑伯墓的父丁铜角，带有棱脊盖，马鞍形器口双翼斜飞，圆腹下外撇三长尖足，盖腹皆饰隐含兽面意韵的勾云纹，鑿饰牛首，鑿内腹壁铸有族徽，徽下“父丁”二字。形饰古雅，展现出商代贵族酒器的雍容气质。两墓中各出一对筒形卣，方棱扁条式提梁，梁与器身套合处，一对卣凸饰牛首，一对卣凸饰羊首，皆清晰逼真；盖坡沿与器身上、下部，一对卣分饰三周对凤纹，一对卣分饰三周对夔纹，皆婉舒自如。盖内及腹内壁各铸昭示器主的对铭。这两对筒形卣的形制、纹饰、铭文同中有异，异中见同，互相呼应，发人深思，为研究黑、奚二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独特的器形尤值得注意，北方游牧部族有用桦树皮卷制筒状容器的习俗，筒形提梁卣当创意于对桦树皮筒的模仿，可能是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凸饰牛、羊首的做法，亦可为这种推想的辅证。黑伯与奚伯是西周王朝的两位军事贵族，故有大量武器随葬。类型之多，已使人惊讶；其中一些造型别致、铸作精良的异形兵器，更令人赞叹。如耳形虎纹



垂鳞纹秦公鼎

铜钺、人头形盔青铜戟、镂空鞘青铜短剑等，都是形饰奇特的精绝之作，在古代兵器研究中有非常高的引用率。

甘肃东部又是秦文化的源起地，至迟在商代中、后期，秦人已在西汉水上游建立了颇有影响的嬴姓方国，其都邑西垂，即在今礼县东境。迁都关



翼兽形提梁卣

中前，秦的国域已包括今张家川、清水一带。上世纪90年代，礼县西垂陵区的发现，印证了嬴秦崛起于甘肃东部那段失落已久的历史。数量可观的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的面世，不仅为早期秦史及秦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也使我们对秦国青铜工艺的源流演变及风格的形成，有了更全面

更准确的认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三件圆鼎，形制、纹饰、铭文相同而规格不一，为列鼎中的三只，作于春秋初年。宽体垂腹，口稍敛，方立耳，平底微圆，三蹄足出山字形扉棱。沿下一周饰窃曲纹，腹饰三周垂式重鳞纹，足饰兽面纹。腹内壁刻铭：“秦公作铸用鼎”。鼎形及纹饰，均与西周后期的同型器一脉相承，铭文字态匀整，笔势流畅，结构紧凑，接近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的意韵，已开始呈现秦字整齐劲秀的独特风格。此外，馆藏器如翼兽形提梁卣、鼎形铜行灯等，都足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工艺所达到的高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至于两诏秦权和铜诏铁权，作为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原始物证，世人更看重它们考史述史的价值。

战国以后，负载贵族社会体制、观念和审美意识的青铜制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青铜器并没有消亡，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人文内涵。汉代及汉代以后的青铜工艺，向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在这方面，除了大量虽然朴素无饰但却设计巧妙、便于实用的日常器皿，足以说明问题外，最佳例证是铜塑作品。摆脱了贵族理念束缚的匠师们，从社会生活中吸取灵感，创作了许多直至今日仍能震撼我们心灵的艺术品。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那列青铜车马仪



鼎形铜行灯



铜车马仪仗俑队



铜奔马